

融合城乡文化重构现代文明生态的思考

□ 王玲玲

在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城乡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成为重构现代文明生态的核心命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塑造了经济社会的基本形态,更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城市文化以现代性为内核,乡村文化则承载着农耕文明的基因,二者在互动中形成共生共荣的文化生态系统。笔者从城乡文化的差异本质、互动机制与融合路径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逻辑与实践价值。

一、城乡文化差异的本质特征

城乡文化差异的根源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城市以工商业为基础,形成了契约精神主导的陌生人社会,文化形态表现为标准化、效率化与个体化;乡村则以农业生产为纽带,维系着熟人社会的伦理秩序,文化特征体现为地方性、经验性与集体性。这种差异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城市的“原子化”居住模式与乡村的“院落式”聚居形态,在时间维度上则呈现为城市的快节奏与乡村的自然节律。

文化传承方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文化的发展。城市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制度化渠道传递知识,文化更新更迅速,创新特征显著;乡村则依赖口耳相传、节庆仪式等非制度化方式延续传统,文化稳定性强,保守性特征突出。这种差异在当代呈现出新的张力:城市文化的扩张性与乡村文化的保守性形成对比。城市青年群体对传统节庆的疏离与乡村老者

对数字技术的茫然,折射出文化代际传递的双重困境。

二、城乡文化互动的实践机制

城乡文化互动的动力源于资源互补与价值重构。城市资本下乡催生了乡村旅游、文创产业等新业态,将现代管理理念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形成“新乡土文化”。例如浙江省安吉县的“美丽乡村”项目,通过引入城市设计理念,将传统村落改造为兼具文化体验与生态价值的复合空间,实现了城乡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通过“文化翻译”机制,将城市的设计语言转化为乡村可理解的营造方式,既保留夯土墙的肌理,又融入现代采光技术,形成独特的建筑美学。

数字技术为城乡文化互动提供了新媒介。短视频平台上的“乡村网红”现象,既是乡村文化向城市传播的窗口,也是城市审美对乡村文化的再塑造。这种“双向凝视”重构了城乡文化认知:城市居民通过虚拟空间接触乡土文化,乡村居民则借助数字工具参与现代文化生产。数字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城乡文化互动进入“液态现代性”阶段,文化元素在虚拟与现实间自由流动,形成新的意义网络。

制度创新是推动城乡文化互动的关键力量。各项非遗保护工程将乡村文化资源纳入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乡村延伸则促进了乡村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例如,县域文化信息馆建设

通过人才下沉与资源共享,在保留乡村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提升了其现代性表达能力。江苏省吴江区的丝绸文化生态保护园,通过建立“城市展厅+乡村工坊”的联动模式,既保持了缂丝技艺的传统工艺流程,又借助数字展陈技术实现文化传播的创新。

三、城乡文化融合的路径选择

城乡文化融合的核心在于构建“双向开放”的文化生态。城市需在保持现代性内核的同时,吸纳乡村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人文精神。例如北京“城市双修”工程对胡同文化的保护性改造,既延续了传统的空间肌理,又植入了现代生活功能。这种改造遵循“微更新”原则,通过增设嵌入式卫生间、改造地下管网等,让百年胡同既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又保持原有的邻里关系网络。乡村则需在坚守文化根基的基础上,主动吸收城市文明成果,如浙江省安吉县余村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转型,体现了生态文化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其核心在于将竹林经济的生态循环理念与现代文旅运营模式有机结合。

文化产业是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通过打造“城乡文化共同体”品牌,可实现文化资源的跨域整合。云南省大理市双廊镇的“艺术小镇”模式,吸引城市艺术家驻村创作,将扎染、甲马等非遗技艺转化为现代艺术产品,形成“生产性保护”的成功范例。这种模式既激活了乡村文化资

源,又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文化体验。

教育体系的重构是实现文化融合的基础工程。城乡学校结对、教师轮岗制度可促进文化认知的双向流动,而乡土课程的开发则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自觉。上海市开设的“江南农耕文化”校本课程,通过城市学生参与插秧、蚕桑等实践活动,使其在体验中理解乡村文化的生态智慧,这种“具身认知”超越了简单的知识传授。更为深层的教育创新体现在职业培训领域,四川省青神县的竹编技艺传习所,既教授传统编织技法,又引入产品设计、电商运营等现代课程,培养出既能守住手艺又能对接市场的复合型匠人。

城乡文化的融合不是消解差异的同质化过程,而是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新型文明形态。这种融合既需要政策层面的制度保障,也依赖经营主体的创新实践,更离不开每个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当前正在推进的“乡村记忆工程”与“城市文化基因解码”项目,正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城乡文化对话的永久平台。当苏州评弹的吴侬软语遇上深圳科技园的电子音乐,当陕北窑洞的剪纸艺术邂逅上海外滩的灯光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化形式的创新,更是文明演进的内在活力。唯有在差异中寻求对话,在差异中达成共识,才能让城乡文化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双轮驱动,最终实现文明形态的整体跃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灵活就业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 林雍骥 肖蝶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灵活就业已突破传统就业模式的边界,成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这种新就业形态不仅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逻辑,还通过要素重组、架构转换和制度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灵活就业重塑人力资本配置方式

灵活就业通过劳动力要素重组,进而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要素重构机制。

首先,破除流动壁垒,构建人力配置的“高速通道”。灵活就业通过数字平台有效地打破了地域、行业、制度的约束,搭建需求与技能即时匹配的流通体系。在算法驱动下,劳动者突破企业围墙与职业边界,形成即需即用的要素流动范式,将传统“人找岗”的单向路径升级为“人岗互选”的双向通道。这种配置方式,使人力资本摆脱物理空间与组织层级的双重锁定,为经济系统注入高效周转的流动性动能。

其次,重塑增值路径,锻造人才成长的“指数增长”。灵活就业创造多任务并行、跨领域协同的实践场景,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性土壤。劳动者在参与项目时,隐性经验首先通过平台反馈给系统,之后显性化为能力信用,最后引导技能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完成使用。这种算法机制,使个体价值随实践频次的增加而增加,且呈指数增长,形成“低阶技能—专精特新—跨界融合”的跃迁路径。既为

行业初入者提供了更多的缓冲时间,有利于劳动技能的掌握,又使得劳动技能成熟者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

再次,激活协同效能,释放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灵活就业构建分布式协作网络,使分散的智力资源围绕创新目标动态聚合。企业通过智能合约快速组建跨组织虚拟团队,将异质性知识要素重组为创新矩阵,最后实现“1+1>2”的效果。知识流动产生的碰撞与融合,既突破传统研发的路径依赖,又通过市场机制筛选高价值方向,最终将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实质性飞跃。

二、灵活就业催生产业组织形态变革

灵活就业通过组织架构转换,进而激发组织形态变革,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态进化机制。

第一,拆解传统组织“围墙”,构建模块化协作新骨架。传统产业组织受科层架构束缚,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灵活就业推动组织向“核心+模块”架构转型,企业保留战略核心功能,将业务拆解为标准化的模块。模块与灵活就业者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连接,形成“需求触发—模块组装”的生产链。这种架构使组织具备积木式重组能力,既能快速响应市场,又降低固定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轻量化基础。

第二,编织新型协作“网络”,形成分布式创新新肌理。模块化架构催生多节点互

联的创新网络。企业、自由职业者、消费者通过平台形成去中心化协作体,每个节点都兼具创造与传递功能。创新活动从实验室转向市场需求驱动,灵活就业者对消费者的洞察直接触发创新活动,使得技术研发与产品迭代在分布式协作中并行。这种网络化模式融合组织与集体的智慧,使产业创新更易突破技术边界。

第三,培育经济系统“生态”,锻造韧性增长的新体质。模块化架构与网络化协作的融合,推动经济系统向有机生态进化。产业链功能可随环境自主调节,模块单元实现局部替换,协作网络保障动态修复。数字平台作为神经中枢平衡供需;灵活就业者通过技能跨界增强适应性。这种生态特质使经济兼具规模效应与敏捷应变,在遇到外部冲击时快速重组受损模块,在遇到机遇时迅速聚合创新要素,是韧性的生态系统。

三、灵活就业完善社会分配格局

灵活就业通过制度创新完善社会分配格局,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共生机制。

其一,破除资本垄断桎梏,再造要素分配的价值锚点。灵活就业推动劳动、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议价权回归市场,打破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单向攫取机制。这种分配机制的革新,使劳动要素在价值分配中获得更大话语权,有效激发了微观主体的创造活力。更重要的是,灵活就业创造了

多元化的价值实现通道,为不同技能层级的劳动者提供了平等就业机会,既矫正了传统雇佣关系中的要素价格扭曲,又通过市场信号引导资源向高价值领域聚集,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经济效率的提升注入新动能。

其二,疏通阶层跃迁脉络,打通连接城乡的活水网络。灵活就业构建低门槛、高弹性的财富创造通道,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职业身份壁垒。外卖骑手的接单量转化为信用资产,乡村主播的流量数据升级为商业资本,形成“劳动—数字—资本”的转化闭环。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分配渗透,使弱势群体更有机会通过多元就业实现财富积累,进而实现身份转换,为内需市场扩容和共同富裕提供微观支撑。

其三,筑牢风险缓冲根基,浇筑公平发展的防护堤坝。灵活就业倒逼社会保障从单位依附转向个体赋权,构建“基础保障+弹性补充”的双层安全结构。职业伤害互助保险、灵活就业者公积金等制度创新,形成风险共担的社会减震器;区块链溯源技术结合累进税制,构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调节器。这种制度设计既避免劳动者陷入零工贫困陷阱,又通过降低系统性风险保障创新活力,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韧性。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红色文化资源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作用及实践路径

□ 马越

青年一代作为潜力十足、富有理想抱负并兼怀实践勇气的社会群体,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他们的价值选择反映了国家精神面貌的时代缩影,更构成了国际竞争格局中的文化软实力要素。当前国际局势正经历以中国为核心推动力量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加强青年的思想引领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新时代必须强化青年的政治认同,坚定理想信念,并达成知行统一的行为自觉。通过构建具有时代性、彰显中华民族特色的育人体系,系统培育青年的价值认知框架,已成为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

一、红色文化资源在青年价值观中的塑造作用

红色文化资源包括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双重维度。物质资源主要表现为革命历史遗址、纪念馆等;精神资源主要表现为革命理论、革命精神等。作为青年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载体,其在实践中具有多重功能,包括强化政治认同、培育理想信念与提升实践能力等。

这些资源不仅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同时还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精华与革命实践智慧。如“四史”中蕴含的众多红色故事和红色基地,有利于帮助青年群体系统认识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有效地强化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党的执政地位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同。

将红色精神与教育体系相融合,科学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价值,诸如建党精神、抗战精神等红色精神遗产富含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这些精神要素可以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激活青年群体的内在动力,提升他们的理论转化能力,实现知识的学习、思维的建构,最终达成知行合一。

二、红色文化资源在青年价值观塑造中的现实困境

时代的向前发展要求教育载体的不断创新,但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在青年群体中的价值功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源开发中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在革命遗址、纪念馆等实体资源的实际开发中,存在着经济效益优先的开发模式。相比资源本身的政治属性、文化传承功能,部分红色文化实体资源过度关注游客的消费需求和商业价值的挖掘,导致教育价值的边缘化。这种功利化取向直接导致红色精神的教育阐释缺乏深度,难以形成有效的价值认同建构。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协同不足。其一,学校所建立的课程体系与当地红色教育资源未能达成长期有效的协同机制。偶发性的教育活动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深度情感共鸣。其二,教师多采取“师讲生听”的传统知识传输模式,缺乏情景化地教学设计,忽略了学生学习需求的自主性,致使红

色精神教育停留在认知表层。

第三,价值内化转化断裂。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爱国主义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智慧,当前许多青年虽紧跟时代发展脉搏,在个人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姿态,但就其社会责任认知方面来说,仍显不足。这就导致了革命历史经验与部分青年的话语体系、行为举止间产生割裂,不能够使学生很好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直接影响了青年行为的实效性。

三、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实践路径

针对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融合教育现实中的困境,特此提出以下可操作的解决路径:

首先,系统性开发策略的建构。除了重视文物保护和游客的参观体验,还要对其所蕴含的精神性遗产实施“价值解码”,邀请专业的学科团队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时代化阐释。在实施的过程中注意建立教育属性评估机制以确保资源开发方向与国家育人目标相契合,确保红色精神正面价值观念的传承不跑偏,平衡市场逻辑与教育逻辑的张力。最后可通过建立红色基因图谱数据库,实现资源整合从地域分散向系统集成的转变。

其次,全方位促进育人模式的创新。高校应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搭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运用虚拟现实(VR)技术构建沉浸式教学场景。定期举行“云游革

命遗址”“历史事件重演”等数字项目活动,突破传统课堂的空间局限,吸引学生的兴趣。注重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创新设计“历史再现小课堂”,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议题辩论等方式实现价值认同,要时刻注意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因材施教地进行教学。实施“双师协同教学”改革,由思政专业教师与场馆讲解员一起开发模块化课程。

最后,重视青年的价值内化。教育部门应作为“领头羊”,牵头建立“校—馆—地”三者的有效联盟,确保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共享、育人。同时,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社会实践考核体系,使青年做到知行合一。鼓励学生社团自主举办“我是红色演说家”“红色文化创意大赛”等活动,激发青年群体的积极性。最后建立动态评价机制,时刻追踪学生的认知行为转化效果。

总而言之,红色文化资源的当代应用,本质是革命历史经验与新时代课题的辩证统一过程。这就要求教育主体用与时俱进的思维在守护精神本源的前提下,发掘符合青年认知规律的教学模式,使红色基因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让青年一代在历史自觉中锚定奋斗目标,在实践担当中淬炼精神品格。

(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贵州红色文化的传播实践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对贵州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再生、活化与丰富,实现数字技术与贵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嵌融合,对推动贵州红色文化资源动态转化与数字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贵州独特的地质风貌和浓郁质朴的民族艺术赋予了贵州红色文化明亮的“贵州底色”。当下,以科技赋能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传播面临着一些行动难题、发展障碍和技术难点。

第一,整合度不够。革命年代,中国红军途经贵州68个县,在各区、县留下了包括红色文化遗址、红色艺术作品及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在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受地理、技术水平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系统采集、整理、整合这些数据资源存在困难。

第二,融合度不够。近年来,贵州推出了“红色旅游”招牌,顷刻间声名鹊起,但部分地区、单位的文旅宣传与红色文化交流传播出现“两张皮”现象,其侧重于吸睛、揽客方面,而弱化了“红色”亮点,忽视了红色文化与当地技术产业、文旅事业的深度融合。

第三,效能度不够。当前,贵州红色文化资源多数仍借助实物陈列、影像投影、实景模拟等呈现形式,AR、VR、MR等新兴技术鲜少普及,数字化效能受阻。受“信息茧房”“信息沟”的影响,贵州红色文化的资源特性和输出能力受阻,其传播效能也大打折扣。

二、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的发展思路

新质生产力、区块链、大数据、6G与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应用,不仅为文化数字化转型和释放红色文化要素价值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贵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指明了方向。

第一,优化整合手段,构建一体化贵州红色文化数字生产新模式。要立足于贵州复杂且丰富的地势地貌和人文传统,借助全景摄影技术、卫星遥感影像采集技术、贴近摄影测量技术等系统采集、归纳、整合省内各类红色旧址、遗址、纪念馆等,借助3D建模、元数据管理等技术对红色文化进行展示。要运用叙事数字技术手段、3D数字动画、红色故事演绎、红色人物弘扬等方法,对不同类型、性质的贵州红色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打造集“文化+科技”“红色主题旅游+视听”为一体的“红色套餐”。

第二,立足发展需要,促进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红色+文旅”是贵州文旅业的“两张牌”“活名片”。要将红色文化传播融入贵州文旅宣传,在潜移默化中将贵州红色文化转化为契合人们个体发展需要的认知图式,缩小“数字鸿沟”,展示贵州“红”。要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打造贵州“动态文旅”,将贵州省内丰富的文旅资源分化成“点”,将红色文化链接成“线”,通过手机推送、公众号宣传、抖音直播等形式为客户推荐一条集“文创娱乐”为一体的“红色路线”,为贵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注入新活力。

第三,紧扣科技创新,搭建贵州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矩阵。要借助新媒体、大数据、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手段横向打通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的接触壁垒,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可视化、可触及,营造“红色记忆+沉浸式”全域传播新模式。如联合高校、科技企业开发技术解决方案,打造虚拟红色IP形象(如“小红军阿贵”),通过短视频、表情包等方式进行传播,衍生出文创产品。要统筹社会各界的力量,借助数据推送、建设红色智库、数字化工厂生产等举措,建立红色文化传播“共同体”,纵向激发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的内生动力。

三、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的价值表征

以科技赋能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不仅是贵州红色文化蓬勃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国家文化数字化转型,助推贵州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科技赋能,让贵州红色文化“新”起来。搭载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列车的贵州红色文化资源在“红色拟态传播环境”和“交互式体验舞台”中以更具体验感、多元化、动态化和新鲜感的传播形式颠覆了传统“庙堂式文化”的传播形式,让贵州红色文化资源在数字化传播过程中实现沉浸式参与、精准化传达和多元化推送,在与群众的无声互动中让文化记忆、革命精神得以生动、完整地激发出来,这不仅能够增强群众的文化自信,还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化魅力。

以科技赋能,让贵州红色文化“跑”起来。数字技术的出现,是贵州红色文化资源传播史上的一次空前革命。在现代信息技术和文化交流“辐射圈”的影响加持下,贵州红色文化资源逐渐与贵州文旅业相结合,以数字化形态走出贵州“大山”,在世界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舞台上向全世界讲好“贵州故事”。这不仅推动了贵州“红色+文旅”业态的发展,为贵州的高质量发展添能赋能,还为贵州红色文化资源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数字化契机。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技赋能贵州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的实施进阶

□ 陈思琴